



• 柏林圍牆上的群眾——從變局中得益最大的卻不是他們。

# 目錄

	自序	1
	引言：歷史終結？	8
首篇	緒論	11
	一、一些對變局的分析 13	
	1.1 溫輝的分析/1.2 蘇紹智、蕭小明的分析/	
	1.3 民陣、民聯的觀點	
	二、經濟改革在東歐的必要性 44	
	2.1 東歐採納斯大林模式的經濟背景/	
	2.2 斯大林模式的體制性局限/2.3 斯大林模式： 從經濟的發展形式到經濟發展的桎梏	
	2.4 歷史潮流：從抽象到具體	
	三、經濟改革對社會生產關係及 階級構成所產生的作用 51	
二篇	匈牙利變局	59
	四、匈牙利經改歷程 61	
	4.1 價格改革/4.2 企業改革/4.3 體制改革/	
	4.4 農業改革/4.5 第二經濟/4.6 外國投資	
	五、匈牙利經濟危機 91	
	六、經改歷程及結果總結 99	
	七、匈共政權與新興幹部階級、 幹部私有化及變局的階級性質 105	
	7.1 匈共政權與新興幹部階級/7.2 幹部 私有化/7.3 匈共放棄一黨專政的階級性質	
	八、匈牙利變局歷程 115	
	九、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 123	
三篇	波蘭變局	125
	十、波蘭工運簡史（1956—1981） 127	
	十一、波蘭國營部門經濟改革 132	
	11.1 1973年的改革/11.2 1982年的改革	
	十二、波蘭私營經濟 140	
	十三、波蘭農業 149	
	十四、波蘭經濟危機 154	
	十五、幹部私有化 158	
	十六、團結工會主流派的演變 161	
	十七、「對話」的階級內容 165	
	十八、圓桌會議 171	

九、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	176
十、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	180
<b>四篇 蘇聯因素及蘇聯變局</b>	<b>183</b>
一、蘇聯經濟形勢	185
二、蘇聯經濟1990年出現滑坡的原因	192
三、蘇聯經改歷程	205
23.1 1985年至1990年 2月蘇共中全會 /	
23.2 1990年 5月至1991年 8月：經改方案之爭	
四、“開放”、“重整”及新東歐政策的客觀基礎	214
24.1 新東歐政策/24.2 “開放”及“重整”	
24.3 “新思維”的如意算盤如何出錯	
五、蘇聯政局發展	230
六、蘇聯各政治流派的階級屬性	239
七、八·一九政變	244
27.1 政變前夕的政局/27.2 8月18至19日 /	
27.3 8月20日/27.4 8月21日/27.5 8月22至	
24日/27.6 為甚麼會發生政變？/27.7 政變失敗的原因	
<b>五篇 骨牌的倒下</b>	<b>269</b>
一、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經濟 情況及經改歷程	271
28.1 東德/28.2 捷克/28.3 保加利亞 /	
28.4 羅馬尼亞	
二、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變局歷程	316
29.1 東德變局/29.2 捷克變局/29.3 保加利亞變局 /	
29.4 羅馬尼亞變局	
<b>附篇 外一章：蘇聯解體</b>	<b>337</b>
<b>蘇東變局的啓示：</b>	<b>335</b>
<b>展望中國社會形勢及民運前景</b>	<b>347</b>
註釋	355
人物譯名表	412
資料出處索引	420

# 蘇東變局圖輯

- “沒有出路。請嘗試取道匈牙利。”  
(原載《經濟學人》89年7月29日號)



- 克倫茨說開放圍牆的決定是由他所作出的。  
(原載《國際觀點》173期)



- “你也一樣？”(原載《國際觀點》172期)



- “你有否為齊奧塞斯庫工作過？” “有。你沒有嗎？”  
（原載《國際觀點》177期）

- 雅魯澤爾斯基：“我們同意用圓型桌子。”  
瓦文薩：“不要開始製造麻煩。”

（原載《國際觀點》159期）

WE AGREED  
TO HAVE A ROUND  
TABLE!!



DON'T  
START  
MAKING  
TROUBLE



“恐龍已被殺。”蘇聯、東歐  
原統治階級沒有因為一黨專政  
結束而消失。

（原載烏克蘭刊物）



---

# 自序 / 引言





# 序

千辛萬苦，這本書終於面世了。筆者希望在這裡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因為筆者今天能寫這一篇《序》，而非因支援中國民運而身在獄中，實屬不幸中之大幸。

歷史在1989年的發展按動了「快前進」鍵。

1月，中國異議分子聯名上書鄧小平，要求釋放政治犯。11日，匈牙利國會接納多黨制。

2月，「四五行動」在香港發起群眾簽名運動，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釋放陷獄民運人士，反應十分理想。兩名「四五行動」代表聯同另外四名社會人士攜同簽名前赴北京，引起震撼。6日，波共與團結工會召開圓桌會議。10日，匈共中委會決議1990年夏季前舉行多黨制國會選舉。

3月，蘇聯舉行人民代表大會差額選舉。

4月5日，波蘭圓桌會議達成協議，國會兩院560議席中261席經由自由選舉產生，選舉6月4日舉行。15日，北京學潮爆發，「四五行動」立刻往新華社香港分社示威，率先在香港發起支援運動。

5月，蘇聯人大首次會議召開，過程每日由電視現場直播。13日，二千北京學生進行絕食。「四五行動」在香港天星碼頭進行無限期靜坐聲援，發動多次群眾遊行示威，反應空前熱烈。

6月3日深夜、4日凌晨，中共進行血腥鎮壓。同一日，波蘭國會選舉投票結果，團結工會囊括261個公開角逐的席位中260個。13日，匈牙利圓桌會議召開，商討國會選舉事宜。

8月23日，《團結周刊》總編輯馬佐維耶茨基出任波蘭總理。

9月，匈牙利圓桌會議決定1990年3月舉行大選。12日，團結工會政府成立。下旬，由於匈牙利開放匈牙利、奧地利邊境，東德出現大逃亡潮，數萬東德人取道匈、奧前往西德，德

共政權危在旦夕。

9月29日，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行六四後首次國慶酒會。「四五行動」決定到會場外進行抗議。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一些其他團體亦決定到會場外示威。

當晚，警方出動數百警察及防暴裝備把現場重重封鎖。警方原先承諾讓隊伍到會場外一接近地點進行抗議，但後來出爾反爾，最後竟然採取暴力鎮壓，公然在馬路上圍毆示威者。包括筆者在內的四名示威者被毆致重傷後被捕。筆者左眼視網膜被打致破裂，視覺受永久性傷害，傷勢至今仍未穩定下來。被捕者後來被控以「非法集會」罪名。

保釋候審期間，「四五行動」陷於白色恐怖。警方企圖一舉殲滅我們，四處搜捕我們成員、包圍我們會址。組織被迫潛入地下，由筆者等數名可以維持地面工作的成員維繫組織的聯絡及工作。回想那段時間，一日廿四小時被警方監視、跟踪、竊聽，筆者從實踐學會了擺脫跟踪的技術。9月29日晚，筆者被警棍猛力插正胸口氣門，家人、朋友催促筆者儘快求醫。但作為組織領導人，組織存亡、同志安危攸關，筆者只有把求醫一事擱置。

10月7日，匈共自行解散。東德突變爆發。

10月下旬，我們摸清警方的目標限於拘控組織領導人，決定組織重返地面。10月底至11月中旬，警方先後拘捕我們四名成員，連同9月29日晚被捕四人，共八人被起訴，其中七人為「四五行動」成員，包括五名常委。

組織恢復地面工作後，我們為被告人組織救援運動。（若被告人被判有罪，以後香港人行使基本人權將會受到很大限制，群眾運動將會受到的打擊，不言而喻。）

9月29日當晚，香港電影工作者舒琪拍攝紀錄片，把警察圍毆示威者部份情況攝入鏡頭。我們把有關片段播放給包括港支聯在內的其他民運、支運團體，以及在街頭播放給市民收看。可惜，除了一些大專學生及個別小團體外，竟然沒有任何團體

願意公開譴責警方使用暴力毆打示威者(李柱銘於9月29日當晚接受電視新聞訪問時，更曾在未知道事情真相前便說警方的處理手法正確及正當)。

11月，捷克、保加利亞相繼出現變局。筆者開始就會務及私事作出入獄後的安排。但事態發展往往出人意表，港英政府於10月底在跟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次爭執中，被迫公開承認拘控「四五行動」成員出於政治原因。市民同情開始漸漸轉向我們一邊。我們一向認為，今次審訊是一次政治審訊，結果視乎當時的政治氣候。但雖然市民同情開始有所轉向，我們還是作好陷囚準備。

12月中旬，審訊開始，我們把上述片段呈堂，並以港英政府公開承認出於政治原因拘控我們為理由，要求法庭終止審訊，引起震撼。雖然法庭推翻我們的要求，控方主要証人面對上述片段，不得不承認警方使用暴力毆打示威者。另一名警司亦承認警方當晚出爾反爾。採訪記者事後告訴筆者，審訊過程中揭露出來的事實令本來站於警方一邊的傳媒改變態度。市民對我們的同情隨著審訊進展與日俱增。終於，在以上環境底下，我們全體無罪釋放。

12月25日，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被處決。東歐變化大局初定。

1989年蘇聯東歐發生變局惹起筆者極大關注，但當時從電訊傳媒、報章只能得到零星的及表面化的消息，心中充滿問號。一般流行的評論，以事態表面現象、不符合事實的一些錯覺及偏見為基礎，無助於解答筆者的疑問(請參閱第一章)。但礙於香港支援運動鬥爭的迫切性及面對港英的「追殺」，筆者一直無法抽身進行研究。

審訊完畢，筆者決定就變局作出深入探討。與此同時，身體內傷發作，筆者亦藉著「四五行動」常委會換屆，退下領導崗位，治理傷勢。這期間，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剛巧舉辦「東歐巨變及其對中國民運前景的啟示」研討

會。當代中國學會的陳志明邀請筆者提交引導討論的報告。除筆者外，當日講者還包括本港學者曾澍基、本港社運分子馬國明及天大的羅永生。當時，經翻查初步資料，筆者對蘇聯東歐變局的理解已得出初步輪廓。

研討會後，筆者進行了幾個月資料搜集。不幸，正當打算動筆之際，內傷嚴重惡化，醫生告誡下，唯有休息一段時間。1990年11月，身體稍為好轉（但至今仍經常復發，能否康復未許樂觀），寫作終於開展。

在香港投身站在勞動大眾立場的政治運動是十分艱辛的事業。基於香港非常特殊的經濟、政治環境，香港是一個很小資產階級化的社會。中國改革開放而令香港大為受惠以來，情況尤為如此。香港群眾政治階級基礎極為薄弱（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港同盟」能夠披上「代表人民利益」的假面紗也是基於這個因素）。要建立一個有群眾基礎的左翼政治運動難比登天。運動難成氣候，自然很難吸收知識分子投身。況且，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得到甚為豐厚的既得利益。此所以左翼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流失率很高。

由於缺乏群眾的經濟後盾，我們在香港只能在工餘時間搞運動。知識分子的流失又嚴重制約著政治工作的分工。

以上環境底下，寫作進展受到很大阻礙。明白我身體狀況的同志、朋友常勸告我應以身體為重。但在現今極右思潮、偏見、謊言、意識形態當道下，把蘇聯東歐變局的來龍去脈還以真面目，及從中汲取關於中國民運前景的啟示，比個人健康遠較重要。

1989年9月29日事件幾乎使我們因投身支援運動而陷囚。在一個支援包括爭取人權在內的中國民運的運動中，我們因堅決行使人權而被港英警方暴力鎮壓，理應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但事實卻剛剛相反，我們竟然處於極度孤立境地。拜一些偶然因素所賜，我們終能化險為夷、起死回生。回想起來，這本書得以完成，實在值得筆者慶幸。

※

※

※

過去一年來，筆者在不同場合介紹自己對蘇東變局的分析。很多人對變局非中國八九民運、六四之功，甚至與兩者完全扯不上關係感到十分失望；對群眾運動在整個變局中僅扮演次要、從屬角色更加感到氣餒。

作為一個投身群眾運動的人，筆者為什麼要強調群眾運動在變局沒有發生過主導作用？首先，真相必須要承認、面對，自欺欺人非但是江湖騙子的行為，更只會防礙制訂正確的政治鬥爭策略。其次，說變局是“人民力量”的勝利根本是一個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用意在於誘騙我們擁護蘇聯及東歐建立西方社會的剝削形態。（按：意識形態一般屬於不自覺，筆者運用“用意”、“誘騙”等字眼是為了文字表達方便起見，沒有自覺的涵義。）筆者揭穿變局的階級內容，指出變局的關鍵發展實為原統治階級在特定客觀環境底下，不得不作出的投向西方陣營的調整，換句話，這些發展的產生是原統治階級而非人民的選擇，有重要的意識形態鬥爭意義。

※

※

※

寫作過程中，朋友給我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兩個筆者沒有接納的意見值得一提。有朋友認為文章就各國經改歷程的討論過於詳細，使人閱讀起來不能一氣呵成。這個意見的後半部份筆者是同意的。但鑒於經改對整個分析的重要性，詳細的論述有一定需要。舉一個例，筆者翻查初步資料時，知道匈牙利1985年把企業產權轉歸企業。不過，所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改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名義上的轉變毫無實際意義。要能夠具體掌握經改對社會生產關係所產生的作用，我們不能滿足於如上述的一般性評語。筆者曾考慮把經改的篇章改為附錄，但最後認為這種安排弊多於利。

同理，筆者對於各國的經濟發展及形勢作出頗為詳細的論述。這除了有助於推翻時下流行的基於無知的偏見外，對於掌握產生變局及變局在各國的不同發展的具體情況及原因更不能缺少。

有朋友認為應把第一章《一些對變局的分析》改為附錄。意識形態可怕之處在於人們把它當作「自明真理」、「常識」。從一個唯物角度指出建基於偏見、意識形態、唯心及違反事實的論點的時下流行論調的錯漏、空白、謬誤的地方，有積極意義。筆者覺得在提出自己的分析前對上述論調作出批評能夠產生較佳的作用。從一般書籍篇章編排的角度看，以上意見是正確的。但筆者以意識形態鬥爭為首要著眼點。

※ ※ ※

筆者一向認為蘇聯、中國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屬於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沒有任何社會主義成份。但行文時經常需要運用「社會主義」等字眼，為免引起混淆，每當談到中共、蘇共等所講的所謂「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附加上引號(黨名、引文除外)。

※ ※ ※

由於寫作過程漫長，而蘇聯東歐變局發展瞬息萬變，各國變局的論述以不同時間為終點。基本上，除波蘭外，其他五個東歐國家的分析截至1990年春、夏的自由選舉為限。波蘭變局以瓦文薩(香港譯作華里沙)當選總統(1990年12月)及別萊茨基政府成立(1991年1月)為終點。此外，筆者還論述了匈牙利和波蘭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

蘇聯發生八·一九政變時筆者剛巧走筆至第廿一章《蘇聯經濟形勢》。政變的發生及其結局，完全符合筆者就蘇聯社會

階級構成、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分析。故此，臨時增添一章分析政變毫無困難。蘇聯1991年底解體，寫作當時進入最後第十九章，筆者決定在該章之後附加一篇《外一章》，就事件作出評析。

※

※

※

筆者希望在這裡就本文所用的“幹部私有化”這個詞作一些說明。字面上，“幹部私有化”犯了語病（請參照“軍隊黨有化”）。“幹部把國家財產私有化”似乎較適當；但它不僅太長，也不能全面表達有關概念的涵義。在東歐，“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NOMENKLATURA”指官僚幹部變成私人有產者。最明顯便是國營企業轉為股份公司，企業幹部無償或以賤價把部份股份歸於私人名下。但法理上把國家財產歸於私人名下僅為官僚幹部變為（公開或半遮半掩的）私人有產者的一種形式。官僚幹部不用把國家財產直接化為私有，也有數不勝數的方法、形式能夠借助激進經濟改革，透過對國家財產的直接或間接操控權中飽私囊、以權謀私。顯然，“幹部把國家財產私有化”的涵義過於狹窄。基於此，筆者決定把“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NOMENKLATURA”直接翻譯成“幹部私有化”。

## 引言：歷史終結？

五十、六十年代，西方國家以戰後重建為基礎，渡過長期的經濟繁榮，社會內部矛盾淡化。那時，以美國一些社會學者為主的一班西方學家，被這種現象所迷惑，提出“意識形態終結”論調。其意思是指在所謂“後工業社會”，社會發展已超越所有社會內部矛盾。當時，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提出分析，凱恩斯主義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體制性積累危機，二次大戰後重建的繁榮，僅為階段性的狀況。（註1）六十年代末期開始，西方國家踏入經濟不穩定期，社會內部矛盾此起彼落、到處湧現，“意識形態終結”論調，不攻自破，落得慘淡收場。想不到，三十年後的今天，蘇聯東歐變革又再一次為西方，以致全球各式各樣右翼人士，提供契機，使這等及類似論調，得以復活，重獲新生。

歐美學院的資本主義辯護士，和以英國《經濟學人》周刊（THE ECONOMIST）為典型的西方傳媒界，過去兩年來，自鳴得意，高談闊論什麼“歷史終結”、什麼“共產主義末日”等等。（註2）他們躊躇滿志道：歷史證明，共產主義（按：他們把「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同）完全破產。經濟上，西方資本主義無比優越；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系統，是全人類所追求的、超越國界、民族、種族的絕對原則及標準。今天，經過一世紀多以來的奮鬥，走過很多很長的曲折道路，人類終於發現，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價值系統，是自己在歷史發展出來的最豐富財富。從此，基於這一共識，人類將不用再在意識形態的紛爭浪費時間，上述的最豐富財富將成為全人類的依歸。一句話，優勝劣敗，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同上按語），這是歷史的英明選擇。歷史，或應該更確切地說，充滿意識形態紛爭的歷史，將從此完結。

以上這種明顯充滿意識形態取向的意見，不僅限於西方知



識圈子，東歐各國共產黨（捷共除外），紛紛放棄「共產主義」，改頭換面，更易黨名，表面看來，更是在行動上給予這種看法最徹底的肯定。

中國民運界及流亡知識界中，同一意見也佔了主導地位。例如，嚴家其先生認為：

“共產主義曾經是人類一種美好的理想。但在它宣告誕生那天起，就注定了它的徹底崩潰的命運。……超越國界、超越種族、超越民族界線的理性準則、原則，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是社會發展的依據……千百年來，在西方和東方，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人們經過長期的努力和奮鬥，不斷地積累使人類社會更為理性化、更為文明的準則、原則。人類社會的這些共同的理性化原則或共同的文明因素有：對人權的確認……對法治原則的確認……對司法正義原則的確認……對憲政原則的確認……對民主原則的確認……對社會公正原則的確認……然而，這種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只有在保障私人財產權、其他人權和政治權利的前提下，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註3）

嚴家其的所謂超越國界、種族和民族的理性化／文明原則、準則，不外乎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價值觀，而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認同及肯定，清楚顯露於他對私人財產權推崇備致的立場。（嚴家其提及“社會公正原則”顯示他跟哈維爾一樣，儘管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加以肯定及認同，持有社會民主傾向。）

陳奎德教授是另一位響應“歷史終結”論調的流亡人士。他在替人類從馬克思主義“脫魔”慶賀之同時，還擔心到在「共產主義」滅亡後“人類的理想主義如何安置的問題”。（註4）

當然，倘若我們在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之間劃上等號，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便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一般

人心目中，這已變成不講自明的「常識」。上述那些知識份子所做的，不過是為這個「常識」裝飾上耀眼的理論外表。

宣佈共產主義（同頁8，行16、17按語）已經滅亡的人，不僅限於右翼分子及其他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所有曾經在一定程度或形式上對以前蘇聯、東歐實行的所謂「社會主義」加以肯定的人都紛紛進行「懺悔」及「檢討」。意共這個西歐最大的共產黨於1990年春放棄「共產主義」，走社會民主路線。《當今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 大不列顛共產黨機關刊物)主編沙克斯(MARTIN JACQUES)宣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現在肯定已經結束。”（註5）《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的賀力第(FRED HALLIDAY)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古典馬克思主義”，而這包括返回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思想。（註6）

筆者一向認為所有以前及現存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屬於國家資本主義（這範疇與十九世紀的自由或放任資本主義作為對照的一種類型（為方便起見，以下一律把這類國家資本主義統稱為蘇式國家資本主義、斯大林模式或蘇聯模式），所以並沒有因為蘇聯、東歐的轉變而陷於思想混亂及危機。但無可否認，在「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同頁8，行16、17按語）」成為「常識」的情況底下，像筆者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很大壓力。要揭穿這個「常識」的意識形態性質，我們不能局限於「蘇聯、東歐根本從來不是社會主義」這類論點，否則很容易會被人指為「逃避現實」。我們必須要能夠為蘇聯、東歐變革的來龍去脈提供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析。提供這樣的一個科學分析有助於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沒有「檢討」的必要；資本主義沒有打敗社會主義；真共產主義運動非但沒有滅亡，相反，無論它遭遇任何挫折，資本主義一日存在，它便始終構成挑戰資本主義的幽靈。

鑒往知來，儘管“歷史終結”論調現在流行一時，它將來步“意識形態終結”論調後塵，遭遇同一命運，是可以預見的事。